

民國文化與  
文學研究文叢

李怡 ◎主編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三編 20

# 文學者的政治

對30年代「京派」形成的考察

屠毅力·著

文  
民  
化  
國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叢文

三 編

李 怡 主編

第 20 冊

文學者的政治  
——對30年代「京派」形成的考察

屠 毅 力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學者的政治——對 30 年代「京派」形成的考察／屠毅力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218 面；19×26 公分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三編；第 20 冊)

ISBN 978-986-322-792-2 (精裝)

1. 中國文學 2. 現代文學 3. 文學流派

541.26208

1030127556

特邀編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丁 帆	王德威	宋如珊
岩佐昌暲	奚 密	張中良
張堂錡	張福貴	須文蔚
馮 鐵	劉秀美	

ISBN-978-986-322-792-2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三 編 第二十冊

ISBN : 978-986-322-792-2

文學者的政治

——對 30 年代「京派」形成的考察

作 者 屠毅力

主 編 李 怡

企 劃 四川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

民國文學與海外漢學研究中心 (籌)

北京師範大學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3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文學者的政治  
——對30年代「京派」形成的考察

屠毅力 著

## 作者簡介

屠毅力：女，1985年生，浙江湖州人。2003年起就讀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先後師從孫民樂、李今兩位先生，2013年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左翼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合作導師張中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史。

## 提 要

對「京派」的命名可以說是八十年代「重寫文學史」的一項核心工程。「京派」不僅因肩負撥亂反正的使命而不可避免地成爲一個「特殊」流派，同時也因之脫胎于「流派史」研究而極易被視作一個既定對象和文學事實。「京派」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存在，當我們隸屬於文學史／流派史敘述而將其從當時駁雜的社會、政治歷史場景中打撈出來時，「京派」就成了一個「脫歷史」的範疇，它的意義也就被局限在了其某些作家、某些作品和某些言論上。「京派」在八十年代的被打撈究其根本正是基於一種對抗性的歷史動機，這一被揀選的流派及其所攜帶的大量審美訊號正是對早一時期以政治運動和政治傳聲筒爲主要內容的文學形態，乃至歷史邏輯的有效反動。在這個意義上，「京派」的成立不僅來自八十年代文學史的結構，同時也來自一種去政治化的「文學－政治」實踐。因此，當「京派」研究在目前的研究體系和格局中愈來愈呈現出一種成熟態勢，我們就愈有必要重新認識八十年代對「京派」命名的種種前提和規約，從而由「文學的京派」真正轉向「歷史的京派」。



# 目

# 次

緒 論	1
第一部分 「京派」研究的幾種模式	1
一、八十年代流派史研究對「京派」的打撈	1
二、八、九十年代文化研究視野下的「京海」	
並論	8
三、新世紀以來對京派「批評」的研究	14
四、文化詩學研究	15
五、「京派」研究之「歷史化」的幾種嘗試	20
第二部分 本書對「京派」研究的思路與方法	24
一、歷史化研究的思路及幾種參照	24
二、全書各章節的安排	32
第一章 「新月」的分化與胡適的議政	37
第一節 夭折的「平社」：一次文學者議政的嘗試	37
第二節 「文治」：胡適的議政理想	41
第三節 胡適對杜威「社群主義民主」的接受與調試	50
第四節 「文學者」與現代民族國家之建設	59

第二章	北京學院體制的重建與北方人事的重組	73
第一節	從魯迅在回平問題上的「躊躇」說起	73
第二節	國民政府參與下的北京學院體制的重建	78
第三章	多重論爭中的「京海之爭」	89
第一節	「京海之爭」與滬上論爭的合流	89
第二節	沈從文的初衷：對新文學的批評	98
第四章	周作人與「苦雨齋」群落的形成	111
第一節	《周作人書信》：一種有意的形式	111
第二節	從《駱駝草》到《書信》：建立一種文風和形象	118
第三節	「藥中要存性」：文學之用	132
第五章	「由京近海」：林語堂與小品文運動	141
第一節	從「自壽詩」說起	141
第二節	一場失敗的通俗化運動：以林語堂主編《人間世》為例	146
第六章	「由京近左」：阿英與小品文運動	159
第一節	小品文的兩種譜系	159
第二節	阿英對小品文譜系的整合	167
第三節	三十年代「散文」概念的調整	171
第七章	「專家」作為一種方案：沈從文與胡適	177
第一節	從滬上歸來：《記丁玲女士》與「文學者」的態度	177
第二節	「專家」的由來：胡適與黨派政治	188
第三節	沈從文的「鄉土」與「專家」：從道德系統到政治方案	193
餘論	「信心與反省」：「後五四」語境中一場舊話重提的論爭	201
參考文獻		213

# 緒論

## 第一部分 「京派」研究的幾種模式

### 一、八十年代流派史研究對「京派」的打撈

對京派的文學史命名無疑是在八十年代，尤其是 1989 年嚴家炎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以及 1990 年吳福輝編選《京派小說選》，為京派的定義、主要作家作品、傾向風格等勾勒了一個基本框架。嚴家炎在《流派史》中的定義是：「京派成員有三部分人：一是二十年代末期語絲社分化後留下的偏重講性靈、趣味的作家，像周作人、廢名（馮文炳）、俞平伯；二是新月社留下的或與《新月》月刊關係較密切的一部分作家，像梁實秋、凌淑華、沈從文、孫大雨、梁宗岱；三是清華、北大等校的其他師生，包括一些當時開始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像朱光潛、李健吾、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蕭乾、李長之等。」〔註 1〕吳福輝在《京派小說選·前言》中則說：「『京派』的文學傾向導源於文學研究會滯留在北方而始終沒有參加『左聯』（包括『北平左聯』）的分子。顯然與『左翼』有社會政治和文學觀念的雙重分野，又絕不與右翼文學認同。逐漸地，清華、北大、燕京等一些大學師生組合成一個鬆散的群體，先後出版了帶有初步流派意識的《駱駝草》、《文學月刊》、《水星》等刊物。特別以 1933 年沈從文執掌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為流派確立的標誌。」〔註 2〕吳福輝是從小說輯選，因此除了作過小說的廢名，《駱

〔註 1〕 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第 205 頁。

〔註 2〕 吳福輝：《鄉土中國的文學形態——〈京派小說選〉前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7 年第 4 期。

駝草》的其他成員像周作人、俞平伯等都沒有進入他對京派文學的概述中。此後的京派研究基本都沒有出脫嚴家炎和吳福輝的這一界定。對京派的命名可以說是八十年代重寫文學史的一項核心工程，不僅因肩負撥亂反正的使命而不可避免地成爲一個「特殊」的流派，同時也因之脫胎於流派史研究而極易被視作爲一個既定對象或文學事實，後來部分關於「誰是京派，誰不是京派」的爭論便是由此導引出來的。

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蕭乾、師陀、汪曾祺的歸屬問題。八九十年代之際這些作家往往還在世，否認或承認自己歸屬京派便往往首先出自他們自身之口，比如訪談。王嘉良等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有文章認爲蕭乾不純屬於京派，因蕭乾自稱 30 年代後期受巴金的影響更大（相關的論文有《論蕭乾的創作道路》，載《文學評論》1984 年第 5 期；《京師訪蕭乾》，載《浙江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 4 期；《略說「京派」與「京派作家」蕭乾》，載《浙江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 年第 3 期）。1989 年，王嘉良、馬華在訪談中曾這樣向蕭乾發問：

現在人們評述「京派」，似乎是概括了一些共同的東西的，說「京派」作家是有意識地使文學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在創作上取自由與獨立的態度，作品大多寫自然美、人性美等。如稱爲老「京派」的周作人多表現出士大夫情調，作品的風格是平和沖淡，沈從文、廢名等作家則寫一種與城市文明相對立的古樸民風，寫鄉情淳厚的牧歌田園之美，這是否可以表述爲是「京派」的共同創作傾向呢？〔註 3〕

顯然這一設問是有誘導性的，基本表達了當時這些後輩研究者對京派作家及其文學風格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 1989 年的這一次訪談一開始，蕭乾就明確否定了京派的成立，訪者在這裡所說「有意識地使文學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一點便是在得到蕭乾的否定意見後提出的商榷。但即使是面對這樣一個更寬泛的問題，蕭乾的回答也仍然充滿了一種老練的「政治正確」，他說道：

講「京派」作家同現實鬥爭距離較遠，恐怕不能這樣籠統地說。在 20 年代後期，北平文壇是以周作人爲盟主的，文風帶有一點士大

〔註 3〕 王嘉良、馬華：《京師訪蕭乾》，刊於《浙江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 4 期。

夫的情調，明清小品式的文章比較流行。一般地說，文風是比較恬淡的。但應當看到，對北平文壇以重大影響的，還有一股文學思潮。

這裡我要特別提到巴金對於改變北平文風所起的重要作用。（註4）

顯然，在八十年代末的語境中，蕭乾的回答極可能有出於政治上的顧慮，在後續的訪談中，他也始終撇清自己在三十年代的活動與京派之間有聯繫。正如上面的說法，他提出了幾個觀點：一是二十年代末至1933年前的北平文壇的確是以周作人爲盟主，並且表現出一種「平穩」的文風；二是周作人個人在老一輩作家中影響較大，而在年輕一代中並不十分流行；三是1933年之後，隨著華北危機的加深及巴金、靳以、鄭振鐸的來平，《文學季刊》等刊物的創辦，北平文壇、文風隨之一新，蕭乾指包括自己在內的一大批青年都被吸引到那一集團中，因此他對訪者稱：「所以你那個『京派』也就沒有什麼市場了，不變也得變。」（註5）蕭乾在八十年代末的這一次訪談中不斷強調這一1933年的變局以及巴金在其後期文學生涯中所產生的轉折性的影響，甚至針對1936年自己一手操辦的《大公報》文藝獎金的評選活動也否認與「京派」相關，「評出這幾部，是同『京派』毫無關係的」（註6），同時爲了證明這一獎項沒有門戶之見，他也透露，最初獲獎的小說不是蘆焚的《穀》，而是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但是蕭軍當時拒絕受獎。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佐證蕭乾所稱獎項的範圍其實並不狹隘這一點，但蕭軍事實上的拒受恐怕也在另一方面說明了問題。八十年代末的這一次訪談在結果上似乎並沒有獲得當時所需的於京派有力的參證，不僅如此，在八十年代文藝與政治這一宏觀問題上，蕭乾也表達了相當的謹慎，訪者曾這樣詢問：「以前不太看重的藝術派作品逐漸被人們重視，而一些注重社會意義的作品則評價相對較低，對此，您有什麼看法？」（註7）對這一八十年代的文學地震，蕭乾也沒有正面讚助，而是舉郁達夫爲例表達了關於文學和文學家本身的複雜性這一論調。而正是基於蕭乾在諸問題上的這樣一種明確表態，使相關研究者在「京派」之成立，或至少是在蕭乾本人的歸屬問題上產生了一定遲疑，王嘉良發表於1991年的《略說「京派」與「京派作家」蕭乾》一文就基本復

〔註4〕 同上。

〔註5〕 同上。

〔註6〕 同上。

〔註7〕 同上。

述了蕭乾在訪談中的主要觀點，並在最後折中地提出蕭乾前期創作是受到「京派」影響的這樣的結論。而我們發現，即便是在作者採訪了蕭乾，並獲蕭乾本人否認後，得出這樣的結論背後其實仍是有一個作者本身所認可的「京派」的存在形態的，即他所說：

「京派」作家的創作最活躍的是 20 年代後期和 30 年代前期。其時的北平一帶，政治上處於相對穩定時期，這裡既已失去了「五四」那段時期曾有過的全國文壇中心的地位，又不及左翼文藝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的上海文壇那般熱鬧，而是處在一個較封閉而又平靜的社會、文化環境中，使得作家們有可能調節內心感情的平衡，去尋求美的享受和悲哀的解脫，創作表現出詩意色彩的加濃和社會意識的淡化，原是極自然的。蕭乾寫於 1933~34 年間的部分作品，帶有一些「京派」味，與此不無關聯。〔註 8〕

顯然，通過對蕭乾的排除，或者依照蕭乾所提供的「斷代」（1933 年），那個作為另一面的「京派」也就得以確立，即作者所說時間在二十年代後期至三十年代前期，尤其是 1933 年華北危機之前，人物是以周作人為首的一批已成名作家。這種通過「排除法」來進行的指認是非常有趣的，顯然，在這一次經過與蕭乾直面商榷的「京派」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仍沒有完全放棄關於「京派」作為流派的認知，而只是將「京派」的範圍窄化，如他們說，限於 1933 年之前的那一平和氛圍與平穩文風。

這一情況在師陀的歸屬問題上也同樣發生過。楊義即認為師陀是介於京派和北平左聯之間，早先在《新文學史料》上亦刊有他與師陀的通信（《〈中國現代小說史〉書簡錄》，刊於《新文學史料》1991 年第 1 期）。師陀在致楊義的信中寫道：「我不記得朱光潛、劉西渭曾講過我屬於『京派』，當時在北平的作家，如馮至、吳組綰等，全不屬於『京派』。『京』『海』兩派看起來是寫作態度問題，骨子裏卻含政治問題。我當時以至現（在）都是魯迅迷，至少是魯迅的崇拜者，」（註 9）在這裡，師陀明確點出了三十年代之「京」「海」派別中的政治問題，這一點蕭乾雖未直接言明，但是從他充滿謹慎的表態中也可以見出，「京派」不僅是在八十年代，即便是在那個過去的三十

〔註 8〕 王嘉良：《略說「京派」與「京派作家」蕭乾》，刊於《浙江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 年第 3 期。

〔註 9〕 師陀致楊義信（1988 年 1 月 26 日），見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書簡錄》，刊於《新文學史料》，1991 年第 1 期。

年代，由這一批親歷者的態度來看，也的確不可能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問題，「京派」在當時所宣稱的與政治無關、或不涉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表態和政治立場。師陀的這一回復無疑是針對楊義去信中所提「京、海派之爭，是不能機械地作政治性判斷的，許多爭論出在藝術風格的追求上」（註10）一點而發，而這也基本上顯示了當時研究者與老作家在理解上的分歧。在1988年師陀作為回憶撰寫的《兩次去北平》一文中就專門敘述了他1931年和1933年兩次分別與北平人事發生的聯繫。1933年他再次回平，開始寫作，與卞之琳、靳以、沈從文結識，並在《水星》、《文學季刊》、《大公報·文藝副刊》發稿，這一段經歷顯然是他後來之被作為「京派」論的一個重要來源，因此在這篇回憶文中他專門述及了自己1931年初到北平的另一段經歷，即參加中共下設的「反帝大同盟」小組，以及與當時北平左聯之間的交集。顯然，師陀對當時社科院所編《中國現代小說史》欲將其歸入「京派」一事是非常不滿的，他專門寫道：「現在反『左』，切望勿右，應該還歷史本來面目，我有個最起碼的要求：今後的文學史萬勿『矯枉必須過正』」（註11）。可以說，師陀在當時就非常敏感地嗅到了這一「重寫文學史」活動中所包含的政治意味，他與蕭乾的堅決抵觸在某種程度上正顯示了兩人在這一問題上的共識。因此，正是基於這樣一種當事人的駁斥，楊義後來發表於1990年的專論《師陀：徘徊於鄉土抒情和都市心理寫照之間》一文亦只好聲明：師陀是「看似京派」，而「不是京派」（註12）。另外，解志熙近期發表的《蘆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師陀作品補遺札記》中則通過對師陀「蘆焚」時期的幾篇佚文的發掘和校讀，進一步豐富了文學史中的師陀形象，以為不僅是1939~1941年蟄居滬上期間醞釀和寫作的《一二·九三部曲》，在抗戰前五六年間，也就是通常認為師陀以出產《里門拾記》、《穀》等小說而為當時的「京派」所關注，並予以提攜的時期，他其實也寫作了另一部分小說、雜文，並在其中顯示了確實的作為左翼作家的姿態，因此通過對這些佚文的發掘和細讀，解志熙總結：「恢復他的準左翼作家或者說自由左翼作家的自由身為是……對他，這才是實至名歸的光榮歸位」（註13）。這也是對師陀

〔註10〕 楊義致師陀信（1988年1月10日），見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書簡錄》，刊於《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1期。

〔註11〕 師陀：《兩次去北平（續篇）》，刊於《新文學史料》，1988年第3期。

〔註12〕 楊義：《師陀：徘徊於鄉土抒情和都市心理寫照之間》，刊於《文學評論》，1990年第2期。

〔註13〕 解志熙：《蘆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師陀作品補遺札記》，刊於

歸屬問題上的最新發現和結論。

汪曾祺的情況則稍不同。嚴家炎在寫作《流派史》時，曾就汪曾祺是否作為「最後一個京派作家」的問題，致信汪，而汪本人也作了肯定的答覆。吳福輝最近在《汪曾祺坦然欣然自認屬於京派》（2011 年）一文中首次披露了 1991 年，他的《京派小說選》剛剛問世不久，即收到汪曾祺主動託王培元轉來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我覺得這本書編得很好。所選各篇不是各家的代表作，而是取其能體現「京派」特點者，這是很有眼力的。前言寫得極好，客觀公允，而且精到。「京派」這一概念能否成立，有人是有懷疑的。我對這個概念也是模模糊糊的。嚴家炎在寫流派文學史時把我算作最後的京派，徵求過我的意見，我說：可以吧，但心裏頗有些惶惑。讀了你的前言，才對這個概念所包含的內容有一個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確實是一個派。這些作家雖然並無組織上的聯繫，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間從未謀面，但他們在寫作態度和藝術追求上確有共同的東西。因此，我覺得這個選集的出版很有必要。一，可以使年輕的作家和讀者知道：中國還有過這樣一些作家寫過這樣的一些作品（集中有些作品我都未讀到過），使他們得到一點理解和借鑒；二，可供寫現代文學史的專家參考，使他們排除偏見，能準確、全面地反映出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面貌。你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好事，我為此很興奮，感謝你。

我想買 20 本選集，好送青年作家，你能否問問出版社，在什麼地方或通過什麼途徑可以買到。

這本書印數太少了！我覺得可以拿到臺灣、香港去出一下。

你寫的前言大可在出書之前先發表一下。出書之後，仍可找地方發表一下。〔註 14〕

吳福輝不無興奮地提到這封信在當時對於「京派」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所起到的鼓舞作用，他寫道：「此信的第一意義，是正當一個作家創作群體的時代剛剛過去，成為有溫度的陳跡，它的『形體』由外到內仍待逐漸呈現，外

《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2 卷第 5 期（2012 年 9 月）。

〔註 14〕汪曾祺致吳福輝信（1991 年 2 月 22 日），見吳福輝：《汪曾祺坦然欣然自認屬於京派》，刊於《現代中文學刊》，2011 年第 2 期。

部應包括哪些作家、刊物尚不清晰，內部的文學總體特徵也『模模糊糊』，有待時間淘洗、刪選，有待社會進一步承認的時候，其中的一位骨幹作家卻帶頭出來支持了這一『命名』的歷史過程。」〔註 15〕在吳福輝的這篇文章中有兩個信息是非常突出的，一是汪曾祺的主動聯繫，因此他在篇名中冠以「汪曾祺坦然欣然自認」的字樣，事實上鑒於前面提到的蕭乾、師陀兩位作家的情況，汪曾祺在彼時主動致信的確是彌足珍貴；二就是作家本人對「京派」之命名的肯定。八十年代的選本對於「流派」的構成意義自不待言，但重要的是，汪曾祺在信中承認，他本來對這一流派的成立充滿「惶惑」，但是自讀了吳的選集及序言後才有了一個清晰的理解，並指出「所選各篇不是各家的代表作，而是取其能體現『京派』特點者」〔註 16〕，顯然，他也意識到了研究者在這一過程中所作的「揀選」工作。汪曾祺的這封信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可以作為一個肯定的佐證，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他所看重的，主要還是這一選本所傳達的文學理念，以及所可能帶給當時的青年讀者和作家們的參照價值。並且如他在信中所說，「這些作家雖然並無組織上的聯繫，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間從未謀面，但他們在寫作態度和藝術追求上確有共同的东西。」〔註 17〕這一表達其實在今天看來，能否作為「京派」之成立的證據尚是存疑，甚至從另一個角度看，汪曾祺的反饋恰恰說明了這個被揀選的「京派」正是由八十年代研究者借助於某種共同標準所建立的，而即便他們之間並無直接的聯繫。

流派史研究的一種重要特徵就是「揀選」。嚴家炎曾針對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跋中所開出的一長串京派名單表示異議，反對「任意擴大京派的隊伍」，在他看來，京派範圍的確定應當是以文學創作的實績為依據，「（吳組緝）明明是個左翼作家，有他當時的作品為證」，「聞一多在三十年代前半期，既不參加文學活動，也不從事創作，只是一心搞他的學術研究」，「朱自清、巴金、鄭振鐸、老舍等，和京派作家雖有聯繫，並不密切，文藝思想和創作情趣尤其不同」〔註 18〕。嚴家炎所代表的這種以作品創作、文學觀念為

〔註 15〕 吳福輝：《汪曾祺坦然欣然自認屬於京派》，刊於《現代中文學刊》，2011 年第 2 期。

〔註 16〕 汪曾祺致吳福輝信（1991 年 2 月 22 日），見吳福輝：《汪曾祺坦然欣然自認屬於京派》，刊於《現代中文學刊》，2011 年第 2 期。

〔註 17〕 同上。

〔註 18〕 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第 210～211 頁。

基礎的「揀選」正是八十年代「流派」之浮出歷史的主要工作，但是這種相對簡單的「相關」／「不相關」的揀選，實際上也遮蔽了很多問題。比如，吳組緝三十年代就讀於清華，與林庚、李長之等的確存在交集，聞一多作為二十年代新文學實踐的重要參與者，他在 30 年代初的轉變究竟源自何種歷史的或其心態上的狀況，等等。

在這裡，我並不是要重新為京派劃範圍，重新命名京派等，八十年代基於意識形態的某些影響而作出的某些判斷是具有歷史合理性的，而我以為重要的並不在於將誰劃入或劃出京派，在將誰劃入或劃出的時候，我們事實上已經預設了一個關於京派的固形和目的。京派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存在，當我們隸屬於文學史／流派史敘述而將其從當時駁雜的社會、政治歷史場景中打撈出來時，京派就成了一個「脫歷史」範疇。京派的意義也就被局限在了其某些作家、某些作品和某些言論上。八十年代伴隨著對京派命名的無疑是對其性質的概述，「與社會政治保持一定距離」，「含蓄、節制、沖淡」、「純正的文學趣味」、「審美理想」等，這些關鍵詞被從京派的作品中概述出來後便隨即獲得了一種相對獨立的超越性。「京派」在八十年代的被打撈究其根本正是基於一種對抗性的歷史動機，這一被揀選的「京派」，及其所攜帶的大量審美訊號正是對早一時期以政治運動和政治傳聲筒為主要內容的那一文學形態，乃至歷史邏輯的有效反動。現有研究中所言稱的那一「京派」並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存在，它的成立不僅在某種意義上來自八十年代文學史的「結構」，同時也來自一種「去政治化」的文學—政治實踐。因此，當「京派」研究在目前的研究體系和格局中日益呈現出一種成熟態勢，我們越有必要重新認識八十年代對京派命名的種種前提和規約，從而由「文學的京派」真正轉向「歷史的京派」。

## 二、八、九十年代文化研究視野下的「京海」並論

京派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文化的研究」，從八十年代中後期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其中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就是對「京派」、「海派」文學（文化）的並置討論，即這一時期對京派的賦意不再單純地依託其文學理念和審美實踐等，而是往往將其置於與海派文學、文化的互文賦意中。在流派史研究中被打撈上來的不僅是京派，同時被打撈的還有海派（當時指的是「新感覺派」或「都市現代派」），兩者同作為八十年代重寫文學史的重要成果，在

「文學史」一致對外的戰役中共同肩負著文學多樣化、文學去政治的使命，因而使得那種三十年代意義上的兩者間的對立反而沒有在第一時間被凸顯出來。可以發現，三十年代的「京海之爭」雖然被作為京派命名的一項重要史實，但在八十年代前期的語境中，構成為京派之對立面的恰恰不是海派。而只有當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國家都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進一步展開，在「地域文化」和「都市文化」視野的關照下，京海派之間的對立才真正地被確立起來，「京海之爭」作為兩者命名的元話語也才被進一步放大。

八九十年代之際所言稱的「文化」是一個跨越不同層面，內涵駁雜的話題，具體到京派研究，可能涉及的有：

一是前一時期由「尋根文學」所導引的「文化尋根」、「鄉土世界」、「傳統／民族文化」等，這裡面由阿城、汪曾祺到沈從文、京派的鏈接是構成這一取向的主要線索。1989年黃子平一篇《汪曾祺的意義》〔註19〕就是比較早的對這一線索進行發掘的文章，通過對「現代抒情小說」這一門類進行脈絡地梳理，而將汪曾祺置於四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相勾連的中介位置上，不僅如此，更將其與八十年代復活的「九葉」詩人等同視作攜帶著新文學資源和傳統進入新時期文學的一種「文學遺跡」和「復蘇」。2011年，羅崗在其《「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論汪曾祺的意義》中一文對黃子平的觀點有所回應，認為「汪曾祺之於中國當代文學的意義，不僅僅在把一個久被冷落的上世紀40年代的『新文學傳統』帶到80年代的『新時期文學』的面前，更重要的是在40年代到80年代之間、往往被視為『空白』的這三十多年，給汪曾祺的創作埋下了怎樣的伏筆，又是如何最終釀造了他的橫空出世。」〔註20〕文中對早一時期李陀就已發現的汪曾祺與五六十年代文學之間的關聯作了進一步論證〔註21〕，包括汪曾祺是如何在四十年代即已掌握的現代派寫作技巧與五六十年代實踐的「民間文藝」之間建立了一種語言上、乃至文學姿態、政治姿態上的融通和轉換等，進而提示：「40年代的新文學傳統如果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汪曾祺的『前理解』，那麼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如何與這種『前理解』發生關係呢？這種關係是否只構成了『壓抑』與

〔註19〕黃子平：《汪曾祺的意義》，刊於《北京文學》，1989年第1期。

〔註20〕羅崗：《「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論汪曾祺的意義》，刊於《文學評論》，2011年第3期。

〔註21〕李陀：《汪曾祺與現代漢語寫作——兼談毛文體》，刊於《花城》，1998年第5期。

『被壓抑』的機制？」〔註 22〕汪曾祺對於八十年代「京派」的重現，尤其是沈從文的重新被發現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特別是 1985 年前後在「尋根文學」對文化譜系和傳統資源的急切探尋中，他本身所提供的這樣一種可以超越「空白」的鏈接顯然也是非常有效的。但這一應時代之需建立起來的脫鏈的歷史聯繫在今天已愈來愈顯示出它的問題，研究者所質疑的正是八十年代建立在汪曾祺本身特殊的創作、身份、乃至自我言說基礎上的這一文學史規劃的合法性，因此要重新探討的不僅是來自社會主義文學實踐的影響，以及間接由汪曾祺消化而進入八十年代文學中的那一四十年代與五六十年代文學的總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於，正如黃子平當時評價汪成熟的藝術形式時寫道：「現代派的意識、技巧，四〇年代新文學成熟期的經驗，怎樣有機地組合在滲透在一個八〇年代中國人對鄉土文化的審美表現之中？……汪曾祺的小說遂成爲八〇年代中國文學——主要是所謂『尋根文學』——與四〇年代新文學、與現代派文學的一個『中介』。」〔註 23〕汪曾祺向八十年代文學所顯現的正是一種當時所急需的對抗性的資源——四十年代成熟的新文學經驗，乃至八十年代剛剛被幾個青年人發現、并引爲先鋒形式的現代派技巧——汪曾祺的存在本身就足以使那一被淹沒的文學群落成爲一個神話。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自動的繼承關係，這一時期由文化尋根所導引下的「文化」範疇基本仍是延續著鄉土書寫傳統中所不可避免的地域文化這一面向。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楊義的研究。在《京派海派綜論》（圖志本）〔註 24〕一書的引言中，楊義比較詳盡地梳理了自己自八十年代以來的學術脈路，包括從八十年代的以「個案研究與現象還原」爲主的小說史整理，到八十年代

〔註 22〕 羅崗：《「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論汪曾祺的意義》，刊於《文學評論》，2011 年第 3 期。

〔註 23〕 黃子平：《汪曾祺的意義》，刊於《北京文學》，1989 年第 1 期。

〔註 24〕 《京派海派綜論》（圖志本）出版於 2003 年，其主體部分楊義的博士學位論文《京派與海派的文化因緣及審美形態》（2001 年）是對之前一系列研究的總結和擴展，主要包括：88 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中有關京派海派的論述「『京派』作家群和上海現代派」一章，寫畢於 87 年的《京派與海派比較研究》一書（後出版於 93 年），93 年在臺北中央研究院的講演《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緣及審美形態》，以及發表於 96 年的同題論文《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緣及審美形態》（刊於《海南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 1 期）。因此這裡我認爲，楊義對京派、海派的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80 年代中後期，其主要的觀點判斷應基本形成於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的時期。而我將其作爲「文化研究」的代表也正是著眼於他這一時期的研究狀況。